

基于谷歌街景的印度语言景观调查研究^{*}

苏 婧 林旭煊^{**}

摘要：印度是世界上语言状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庞大的语种数量和多样的语系划分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研究，主要基于文本等素材开展，缺乏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实态进行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利用谷歌街景采集了印度 3 个典型城市的标牌，以语言景观理论和“SPEAKING”模型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 606 个有效样本，探讨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在印度产生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印度语言景观通过适当的语码选择、多语言安排策略以及语码混合，实现了标牌信息的有效传达，其语码特征也可作为地域区划的标志。另一方面，本邦语言较高的出现频率可以发挥象征人口权重的功能，然而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出现频率与实际使用英语的人口权重并不相符。此外，联邦政府和地方势力创设的语言景观体现了印度语言的民族性和政治性，象征了官方意志和各语言群体的族群认同的混杂。印度作为典型的多语言国家，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到印度各语言群体的交流、沟通和权势关系，与印度国内民族关系和政治局势有密切关联。印度对语言问题的治理方式，亦可为世界上各多语言、多民族国家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印度；多语言；语言景观；谷歌街景

^{*} 本文是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南亚地区的媒介生态以及面向南亚的国际传播战略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THZWYY12）的阶段性成果。

^{**} 苏婧，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中心讲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健康传播；林旭煊，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电子工程、跨文化传播。

一、引言

印度是世界上语言状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庞大的语种数量和多样的语系划分两个方面。印度宪法第八附则中共列出了 22 种官方语言^①，其中印地语和英语是国家层面的官方语言。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的语言调查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政府认定的可确定的母语达到 1369 种，另有 1474 种未被确定的母语。^② 这些语种在印度的地域分布十分割裂，例如，印地语在印度北部地位较高，但在南部，其地位远远不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语言。

印度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语言是印度民族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印度民族认同的标志，更是影响印度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对印度语言状况的研究对理解印度社会、民族和国家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有关印度语言状况的众多议题中，多语言现象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对印度多语言现象成因的追溯，有学者指出历史上没有真正统一印度的王朝，导致印度长期无法实现语言的统一。^③ 有学者则认为印度多语制的格局主要是殖民主义统治与实行联邦制的结果。^④ 也有学者指出，印度的宗教体系、地理上的隔绝以及古老的村社制度形成的小族群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印度多语言格局的形成。^⑤ 二是对于印度多语言现象的影响的研究，学界认为多语言现象作为积极力量，在减少沟通障碍、保存文化传统等方面作用重大，尤其是对于个人和社区而言。但另一方面，多语言现象的存在难免使小族语言面临严峻的边缘化危机，进而催生各语言群体为争取语言权利而造成的政治

① “Eighth Schedule: Languages”, *Constitution of India (as on 26th November, 2021)*, December 24, 2022, pp. 356–357, <https://ddashboard.legislative.gov.in/sites/default/files/COI...pdf>.

② Government of India, “Introduction”, *Language Atlas of India 2011*, New Delhi: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 Census Commissioner, 2022, pp. vii-x.

③ 周庆生：《印度语言政策与语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 年第 6 期，第 102—111 页。

④ L. 法索尔德：《印度社会多语制》，谢广华译，《民族译丛》1985 年第 6 期，第 21—25 页。

⑤ 肖宪、毕媛媛：《印度的语言政策与族群关系》，《思想战线》2021 年第 2 期，第 12—20 页。

局势不稳定、政治冲突和斗争等问题。^①三是对与多语言现象相关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和相关统计数据，从大处着眼探讨印度语言政策的演变并加以评述。然而，目前学界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研究，较少涉及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实态进行实证分析。

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为考察印度多语言现象提供了新的语言学视角。其中，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关注空间交际实践中空间、语言、交际主体的互动，被用于探讨不同语言及语言群体在多语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权势等问题，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语言景观的视角考察印度多语言环境的实态，通过分析印度语言景观的实际表现与语言景观理论的相关性与差异性，实证并评价印度语言景观的两大功能，以此填补对印度多语言现象的语言学实证研究的空缺，并尝试对语言景观理论进行探讨和完善。

二、语言景观研究综述

语言景观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尚未明确提出“语言景观”这一术语，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是以公共空间语言标识为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理论性、系统性。

1997年，罗德里格·朗德里（Rodrigue Landry）和里夏尔·布里（Richard Y. Bourhis）首先对语言景观进行了明确定义，即“公路标志、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业标志和政府建筑物上的公共标志的语言结合起来形成特定领土、区域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②，并提出语言景观具有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两大功能。其中，信息功能包括展示标牌内容、指示地域区划、体现语言权势等方面，象征功能则包括象征人口权重、官方意志、族群认同等方面。此后，国外语言景观研究逐步兴起。

① 刘长珍：《从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转变——印度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7—8页。

② Rodrigue Landry & Richard Y.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6, no. 1, 1997, pp. 23–49.

21 世纪以来,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快速发展, 其主要成果可从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分别阐述。

在实证研究层面, 语言景观相关研究的范围呈现出逐渐拓宽的趋势。首先是研究区域的拓展, 罗伯特·布莱克伍德 (Robert Blackwood) 等人编写的论文集中涵括了四大洲的个案研究, 表明语言景观研究的视野已经扩展到非英语地区。^① 其次是语言景观研究的历时性也有所延拓, 例如洛德维克·泰奥多罗斯·迪普莱西斯 (Lodewyk Theodorus Du Plessis) 考察了南非农村不同时期的语言景观, 揭示了受语言政策影响的一段时间内, 农村语言中不同语言消失或强化的过程。^② 此外, 随着语言载体的不断发展, 语言景观研究中语言标志的边界也不断扩大, 呈现更加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车身广告、电子屏幕、涂鸦、文化衫、网络界面等非典型语言标志被纳入语言景观实证研究对象的范畴。^③

在理论研究层面, 语言景观相关研究多以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开展, 使得语言景观理论框架日益完善。朗·斯科隆 (Ron Scollon) 和苏茜·黄·斯科隆 (Suzie Wong Scollon) 基于视觉符号框架, 建立了场所符号学理论, 关注现实场所中语言符号系统的语码取向、字刻、置放等要素。^④ 博纳德·斯波斯基 (Bernard Spolsky) 发展了语言景观中的语言选择理论, 认为公共标牌的语言选择表明标牌创设者及其预期读者熟悉所选用的语言, 且该语言在当地有一定的权势, 因此语言选择可作为语言景观的主要研究对象, 是研究城市社会语言生态的有效途径。^⑤ 戴尔·海姆斯 (Dell Hathaway Hymes) 将言语活动主要构成要素总结为“SPEAKING”交际模型, 索姆·许布纳 (Thom Huebner) 将这一模型引入语言景观研究, 具体来

① Robert Blackwood et al. eds., *Negotiating and Contesting Identities in Linguistic Landscap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pp. xvi-xxiv.

② Lodewyk Theodorus Du Plessis, “The role of language policy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changes in a rural area of the Free State Province of South Africa”, *Language Matters*, vol. 43, no. 2, 2012, pp. 263-282.

③ 尚国文、周先武:《非典型语言景观的类型、特征及研究视角》,《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4期,第37—47、60页。

④ Ron Scollon & Suzie Wong Scollon,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16-166.

⑤ Bernard Spolsky,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in Elana Shohamy &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5-39.

说, S (Setting and scene) 代表语言景观中相对于读者的时空方位构成的语境及其构建的社会意义, P (Participants) 指向语言景观的创设者和读者, E (Ends) 主要指语言景观的创设目的, A (Act sequence) 关注语言条目的空间组织形式, 包括语言排列的先后顺序、凸显程度等, K (Key) 主要考察语言景观中的语码选择, 有时也包括文字密度、信息准确度等角度, I (Instrumentalities) 主要探讨语言景观中的词法、句法等语法问题和语码转换、语码混合等语言现象, N (Norms) 指特定环境下参与者的交际规约, G (Genre) 则需要对标牌的体裁类型进行分类研究。^①“SPEAKING”模型对语言景观进行全面要素分析, 是当前语言景观研究较为前沿的方向。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起步晚于国外。尚国文、赵守辉于201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综合考察了语言景观研究的背景、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发展前景及挑战等, 初步展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 对国内引介语言景观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引起了国内社会语言学者的广泛兴趣。近年来,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 主要借助语言景观理论, 为我国乡村振兴、城市公共治理和国际化等发展问题提供参考。目前,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大多选择国内城市或乡村作为研究区域, 以传统的拍照方法获取语料样本, 缺乏跨国的语言景观研究。因此, 本研究对印度的语言景观展开调查研究, 在研究范围层面填补了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空白。

三、研究设计

(一) 语料样本采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谷歌街景作为语料来源, 在各抽样区的街景图片中截取街道两侧的告示牌、招牌、海报等公共标牌。其中, 对标志较少的抽样区进行全面采集,

^① Thom Huebner, “A Framework for the Linguistic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Elana Shohamy &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70–87.

对标志较多或标志排列、堆叠关系复杂的抽样区，在等距的每个街景采集点均随机采集相同数量的样本。

在语料分析过程中，根据彼得·巴克豪斯（Peter Backhaus）的界定方法，将每一块拥有明显边框的标牌视为一个样本^①，其中因文字模糊、遮挡等客观因素导致判断语种困难的样本为无效样本，同时剔除内容同质的样本（如位于不同街道的同品牌连锁店的标牌、重复出现的道路标识等），其余样本为有效样本，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共 606 个。

本研究采用许布纳的“SPEAKING”模型描述样本标牌的各个要素，其中包括空间方位、标牌的创设者和读者、创设目的、语言条目的空间组织形式、语码选择、语法和语言现象、交际规约和体裁类型，并基于所获取的要素特征展开相关论述。

（二）语料抽样区概述

本研究选取了印度 3 个典型城市的行政职能区、商业区及背街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行政职能区、商业区、背街受官方影响的程度和对外开放需求均依次递减。选取的城市及抽样区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城市与抽样区

样本城市	行政职能区	商业区	背街
德里 (Delhi)	Chanakyapuri (A1)	Chandni Chowk (A2)	Block D, Kamla Nagar (A3) Block X, Budh Vihar Phase II (A4) F Block, Rajdhani Park (A5)
班加罗尔 (Bangalore)	Ambedkar Veedhi (B1)	Gandhi Bazaar Main Rd. (B2)	9 th X-Rd., Sampangi Rama Nagar (B3) 11 th X-Rd, Vidyamanya Nagar (B4) 3 rd X-Rd, Railway Men's Colony (B5)
金奈 (Chennai)	Fort St. George (C1)	Monegar Choultry Rd. (C2)	Purasaiwakkam (C3) 124 th Block Rd, Elandanur (C4) 5 th St, Tiny Sector (C5)

注：后文在必要时以各抽样区的代号（如 A1 抽样区）代替具体地名。

① Peter Backhaus,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A look into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vol. 3, no. 1, 2006, pp. 52–66.

德里是印度首都所在城市,大致可按开发年代分为旧德里和新德里两部分。德里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辅助官方语言为旁遮普语、乌尔都语。^①考府利耶城(Chanakyapuri)为印度联邦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里建立的外交飞地,是大多数外国驻印度使馆的所在地。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商业区是旧德里最古老、最繁华的市场之一,最初由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沙·贾汗于17世纪规划并建设,至今仍是全印度最大的批发市场之一。^②

班加罗尔是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是印度南部的重要城市之一。班加罗尔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是印度科学研究的中心。班加罗尔的官方语言是卡纳达语。^③安贝德卡尔街(Ambedkar Veedhi)是班加罗尔重要的行政机构和公办教育机构聚集区,其中行政部门的职能涵盖选举、司法、移民管理、公共卫生等方面。甘地集市主路(Gandhi Bazaar Main Road)是班加罗尔的商业中心之一甘地集市(Gandhi Bazaar)的主干道,覆盖餐饮、电子产品销售、金融服务等行业。

金奈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是印度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也是孟加拉湾重要的贸易枢纽。金奈拥有丰富的达罗毗荼文化遗产。^④金奈的官方语言是泰米尔语,辅助官方语言为英语。^⑤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原为东印度公司在该地建立的一座堡垒,现与其周围区域形成了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立法议会及其他行政机构的驻地。莫尼加尔-乔尔特里路(Monegar Choultry Road)是金奈的重要商业街之一,销售的产品以服装为主。

背街为随机选取的聚居程度较高且较偏僻的街区(或街道),能较真实地反映

①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Government of India, "50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India", December 25, 2022, p. 9, http://164.100.166.181/annualreport/50thReport_CLM_English.pdf.

② P. S. N. Rao、纪雁、沙永杰:《印度德里城市规划与发展》,《上海城市规划》2014年第1期,第78—86页。

③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Government of India, "50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India", December 25, 2022, p. 123, http://164.100.166.181/annualreport/50thReport_CLM_English.pdf.

④ 阮荣春、朱浒:《从孟买到金奈——南印度佛教美术遗迹考察笔记》,《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3年第2期。

⑤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Government of India, "50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India", December 25, 2022, p. 9, http://164.100.166.181/annualreport/50thReport_CLM_English.pdf.

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语言景观实态。为了确保背街的数据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所在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均随机选取了三个背街。

四、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信息功能

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公共标牌中的语言文字本身可以实现信息从标牌创设者到读者的单向传达，另一方面体现在某一区域内的语言景观指示了该区域内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各语种在该区域内的权势关系。前者是语言景观存在的前提，景观设置首先需要充分考虑标牌的实用价值，后者则有助于通过可视的信息分析社会语言结构。调查发现，印度语言景观较好地发挥了其信息功能。

1. 展示标牌内容

为了有效地展示标牌内容，标牌设置者需要考虑受众对标牌语言的接受程度。首先考虑“SPEAKING”模型中的“语码选择”要素，根据标牌中出现的语种数量，可将标牌分为单语标牌、双语标牌、多语标牌三类。^①对有效样本进行分类，得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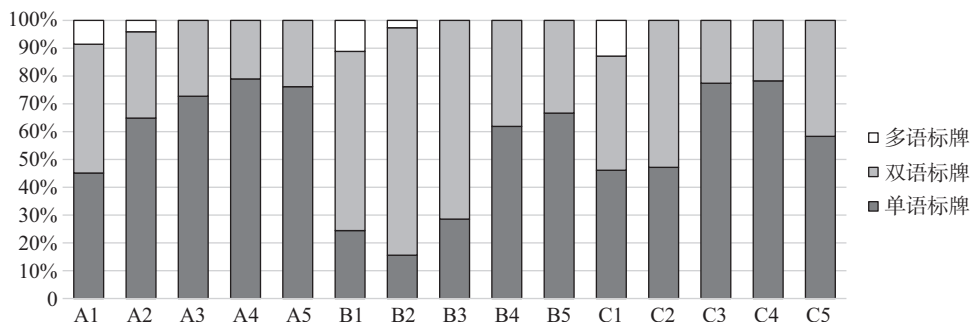


图1 各抽样区不同语种数量标牌百分比堆积图

① Mee Ling Lai,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Hong Kong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vol. 10, no. 3, 2013, pp. 251–272.

从图1可以看出,尽管印度各地均处于多语言环境之中,但大多数标牌设置者并不倾向于将当地使用的所有语种包含在标牌中。多语标牌在3个城市的实际使用率都较低,且多语标牌出现频率最高的区域均是行政职能区,样本中的22块多语标牌均为官方标牌,均为主干道重要枢纽指示牌或联邦级政府机构标牌。以“英语+本邦语言”构成的双语标牌在3个城市的样本中占比都较高,班加罗尔的这一特征尤其突出。背街则是各城市单语标牌占比最高的区域。

斯波斯基的语言选择理论认为公共标牌的语言选择需要遵循三个条件,一是使用标牌创设者熟悉的语言,二是使用标牌的预期读者所需要的语言,三是使用可以体现创设者身份或可以体现所有权的语言。^①这些条件与“SPEAKING”模型中标牌的创设者与读者有关。联邦级政府机构,尤其是驻地不在首都辖区的部门或军事基地,更需要体现官方意志和意识形态,以此来构建语言的权势。联邦级政府机构在作为标牌创设者时,一方面需要落实印度内政部下属的官方语言部门的相关政策,即“官方所有铭牌、标志牌均应使用印地语和英语”^②,又要将驻地所在邦的人口作为预期读者,将当地语言纳入标牌中,以此体现与驻地所在邦的语言联系。因此,对于官方设立的标牌,使用多语是必要的(如图2)。



图2 位于首都辖区之外的联邦级政府机构标牌(B1抽样区)

资料来源:谷歌街景实拍截图。

-
- ① Bernard Spolsky, “Prolegomena to a Sociolinguistic Theory of Public Signage”, in Elana Shohamy &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25–39.
- ② Department of Official Language, “2022–23 Annual Programme for Transacting the Official Work of the Union in Hindi”, December 25, 2022, p. 5, https://rajbhasha.gov.in/sites/default/files/ap_2022_23_0.pdf.

与之相反,背街的标牌创设者多为个人或小型商户,在印度社会中,这类创设者大多为单语或双语使用者,不具备提供多语标牌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类标牌的预期读者往往只限于街道或街区,基于地理位置关联的小范围群体构成的语言社区往往是单语化的,只要使用一种语言就可以基本满足需求。

这一调查发现表明,印度语言景观创设者基于标牌预期读者和功能需求考虑,选用契合区域实际的语种数量,既做到尽可能覆盖受众,使得该区域掌握不同语言或有不同信息需求的人群都能从景观中获取所需的信息,又不至于造成较严重的信息冗余。

通过对标牌内容的分析发现,标牌设置者通过建立适当的多语安排策略,适当采用语码混合,也有利于在多语言环境中展示标牌内容。对于“SPEAKING”模型中的语言条目的空间组织形式要素,根据梅希尔德·雷赫(Mechthild Reh)的观点,按照不同语言文本之间是否存在翻译关系,多语言安排可分为以下四种模式:重复(duplicating)、截段(fragmentary)、覆盖(overlapping)、互补(complementary)。^①其中,前三种模式中均表示一种语言提供的信息完全包含或部分包含另一种语言提供的信息,并不要求读者具有理解所有语言的能力,如图3,卡纳达语和英语的意思完全相同。而互补模式比较特殊,表示多语言文本提供的信息互不重叠,只有掌握所有语言才能完整提取文本的信息,如图4,英语用于展示店铺的基本信息,印地语用于展示该店铺的促销活动信息。



图3 典型重复模式标牌(B2抽样区)

资料来源:谷歌街景实拍截图。

① Peter Backhaus,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A look into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vol. 3, no. 1, 2006, pp. 52–66.



图4 典型互补模式标牌 (A3 抽样区)

资料来源：谷歌街景实拍截图。

调查发现，在样本的双语、多语标牌中，几乎所有标牌都使用了前三种模式中的一种。这样的多语策略为掌握不同语言的读者在同一标牌上获取等价的信息提供便利，在印度的环境下主要体现在不掌握英语的民众可以直接通过本邦语言获取标牌的信息。在样本中，还存在大量英语文本，其本质是印地语-英语语码混合的产物，即用英语语码（拉丁字母）表示印地语词汇和语法。如图5，英语文本MANOHAR实为印地语词汇मनोहर（意为“可爱的”“迷人的”）的拉丁字母转写。这一发现对应“SPEAKING”模型的语法和语言现象要素，采用类似的语码混合模式，读者只需拼读而非理解便能获取英语语码提供的信息，这种语言变体的应用降低了读者获取标牌信息的门槛。



图5 典型印地语-英语语码混合文本 (A3 抽样区)

资料来源：谷歌街景实拍截图。

2. 指示地域区划、体现语言权势

标牌首先指示地域区划，需要对不同地区的标牌分别分析，即按照“SPEAKING”模型中的时空方位进行划分。其次，标牌的语码选择和语言排列的主次是语言权势关系的表现。为了研究印度各城市语言景观在语种层面的总体特征，本研

究按城市分别统计了英语、印地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卡纳达语、泰米尔语在标牌样本中出现的频率，如表2所示。

表2 各城市标牌中各语种出现频率 单位：%

城市	英语	印地语	旁遮普语	乌尔都语	卡纳达语	泰米尔语
德里	79.58	57.92	5.00	5.00	—	—
班加罗尔	83.42	3.63	—	0.52	88.08	—
金奈	69.82	4.73	—	—	—	68.64

注：“—”表示该语言未出现在该城市的标牌中。

根据场所符号学的理论，双语或多语标牌中不同语种的优先关系，主要依据语种所占据的空间大小和置放顺序确定。占据空间大小有明显优势的语种被优先选定为优势语种，若占据的空间无明显优势，再按照语种的置放顺序选择优势语种。一般来说，在中心包围排列式中，出现在中心位置的为优势语种；在上下排列式中，位于上方的语种为优势语种；在左右排列式中，优势语种一般位于左侧，若标牌上存在文字阅读方向为从右往左的语种（如乌尔都语），则选择右侧的语种作为优势语种。^①同时，将单语标牌上的语言视为该单语标牌的优势语种。英语、印地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卡纳达语、泰米尔语在各城市标牌样本中作为优势语种出现的频率如表3所示。

表3 各城市标牌中各语种作为优势语种出现频率 单位：%

城市	英语	印地语	旁遮普语	乌尔都语	卡纳达语	泰米尔语
德里	50.00	48.33	1.25	0.42	—	—
班加罗尔	41.45	—	—	—	58.55	—
金奈	40.83	2.37	—	—	—	56.80

注：“—”表示该语言未作为优势语种出现在该城市的标牌中。

从表2、表3可以看出，印度不同地域语言差异十分明显。在调查涉及的三个城市中，除了英语和本邦语言，其他语言的出现频率都很低。究其原因，这是印

① Ron Scollon & Suzie Wong Scollon,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16–166.

度语言分邦的基本原则导致的必然结果。早在 1905 年,印度国大党就初步确定了以语言为基础重新划分印度行政区域的政治主张,并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不断重申和完善。^①这样的行政区划使得印度各地域的语言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各邦在广泛使用本邦语言的过程中,使本邦语言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指示所属语言区域的边界。

调查结果中,作为优势语种出现的语种也同样是英语与本邦语言,印地语在德里地区之外很难取得优势地位。这直接反映了相互竞争的语言的相对权力和地位。相关研究表明,在如今的印度社会中,各语言之间相互竞争的局面为:英语与各邦语言阻止印地语主导地位的形成,而英语、印地语与各小语种共同阻止邦语的强势扩张,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闭环。^②由此可见,语言景观实态可以较为客观地展现印度语言权势关系。

(二) 象征功能

作为族群的重要标志,语言景观承载着和族群相关的权力、地位与情感向度等象征意义。调查发现,在人口权重方面,印度语言景观的象征意义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更鲜明地体现在象征官方意志和族群认同上。

1. 象征人口权重

根据朗德里和布里的观点,一种语言在城市中的出现频率较高,往往暗示着掌握该语种的人口在区域内占有较大的权重,因此对区域内的语言使用状况具有一定的控制权。^③

根据语码选择要素的统计结果,在所涉及三个城市中,英语和本邦语言出现频率都较高。印度实行按照语言分邦的政策,一个城市的人口大多以使用本邦语言的人口构成,是这一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因此,本邦语言在语言景观中较

① 高子平:《语言建邦与印度半联邦制的形成》,《史林》2008年第5期,第149页。

② 高子平:《语言建邦与印度半联邦制的形成》,《史林》2008年第5期,第149页。

③ Rodrigue Landry & Richard Y.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6, no. 1, 1997, pp. 23-49.

高的出现频率符合语言景观理论,在印度语言景观中,本邦语言较好地发挥了象征人口权重的功能。

另一方面,统计结果显示英语在印度语言景观中具有极大优势,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然而,根据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印度掌握英语的人口不足总人口的5%,即使是调查结果中英语优势体现最明显的德里,将英语作为母语或第一、第二外语的人口也仅占总人口的31.72%。^①由此,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象征功能与人口普查数据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矛盾。

这样的调查结果虽然与理论存在矛盾,但事实上是符合印度实际语言状况的。

首先,从历史渊源上讲,英语的这一优势,既是英国殖民遗留,也是印度独立后官方妥协于地方的结果。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近200年时间里,英国殖民者设法在印度各个领域全面推广英语,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将英语作为印度高等教育的唯一语言,将掌握英语作为印度人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等,这些政策使英语逐步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②印度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的任何机构都无法脱离英语正常运行。尽管印度联邦曾试图从法律层面进行“去英语化”,但最终未能实现。

如今,英语作为印度国家层面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成为可以沟通全印度的唯一语言。民众对于英语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有调查表明,英语在印度语言景观的优势地位增强了印度民众学习英语的意愿,因为掌握英语意味着有机会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③从语言景观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不论是官方标牌还是私人设置的标牌,都对英语表现出了接纳和认同。

其次,在标牌中可观察到的语言条目的空间组织形式和语言现象,如上文提到的多语言安排策略和语码混合也为英语在非英语社区中的使用提供了可能性。上文所述的语码混合,可以使非英语人口理解英语语码所提供的信息,这种混合所造成的语言变化进一步形成了语言分化。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在不同语言

① Government of India, *Language Atlas of India 2011*, New Delhi: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 Census Commissioner, 2022, pp. 83, 239.

② 刘长珍:《从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转变——印度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53页。

③ 潘倩、杨维东:《英语在印度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教育评论》2012年第3期,第162—164页。

接触并产生混合的情况下,将有机会造成不同语言和方言的融合。当印地语-英语语码混合被广泛采用后,语言之间不仅限于词汇转写,也可将印地语的构词和语法直接植入英语文本中,于是催生出了二者的融合语言。在印度语言景观中出现的大量混合语言,实际上将使用英语语码的人口从掌握英语的人口扩展到可以使用当地语言(或语音)解读英语语码的人口。因此,可以认为印度语言景观中某种语言对人口权重的象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掌握该种语言的人口,而也指可利用其他语言实现对陌生语码的理解的人口。

2. 象征官方意志和族群认同

根据调查结果,印地语在班加罗尔、金奈的出现频率很低,在德里这一以印地语为官方语言的城市,其出现频率和优势频率甚至不如英语。进一步分析班加罗尔、金奈含有印地语的标牌,发现这些标牌均来自联邦级政府机构,而在其他场合几乎没有在标牌上使用印地语的情况。

可见,尽管印度联邦政府在法律、行政等方面极力推广印地语,这是印度联邦官方意志的体现。但从语言景观的角度看,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印地语在不以印地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仍未得到重视。事实上,南部邦反对印地语的推广是一个长期问题。1955年,印度联邦政府建立官方语言委员会,试图推行印地语“单语政策”,金奈所在的泰米尔纳德邦成立了反印地语组织,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活动。^① 尽管印度联邦政府已不再强制要求南部邦使用印地语,南部邦对印地语的反抗仍未平息。2022年10月,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就印度官方语言部发表的“强化印地语”报告向总理莫迪致信表达抗议。^② 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印度南部邦对联邦语言政策的反抗态度,语言成为印度民族政治的一大筹码,这种反抗态度表现了南部各邦民族的内部认同和一定程度上的排外性。

此外,在本研究的样本中,有较多涉及政治选举的宣传海报,这些海报被归类为官方标牌,其语言选择体现了印度语言的民族性和政治性。然而,与上文提

① 刘长珍:《从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转变——印度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74页。

② “Tamil Nadu CM MK Stalin Writes to PM Narendra Modi on ‘Efforts To Impose’ Hindi in the State”, October 16, 2022, <https://www.latestly.com/india/news/tamil-nadu-cm-mk-stalin-writes-to-pm-narendra-modi-on-efforts-to-impose-hindi-in-the-state-4338174.html>.

及的主干道重要枢纽指示牌或联邦级政府机构标牌不同,样本中出现的所有政治选举宣传海报均属于单语标牌,并且全部使用本邦语言。因此,官方标牌对受众和功能的考虑,不仅体现在多语标牌中,也体现在其拥有特定功能的单语标牌中。从印度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印度的几大民族基本都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邦,使民族、语言和行政经济利益紧扣,形成稳固的地方势力。^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结合印度民众识字率严重偏低的社会现实,可以认为地方政党希望通过使用本邦语言使民众更加直接地理解政党的主旨,以建立民族认同。甚至有部分地方政党,试图以语言为切口,以政党的名义争取本邦更多的独立权,从而赢得当地民众的支持,进而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席位。印度政治选举宣传海报的单语性质是印度众多地方政党意图构建的族群认同在语言景观中的实际体现。



图6 政治选举宣传海报(A2抽样区)

资料来源:谷歌街景实拍截图。

五、余论

本研究收集印度语言景观实态,在语言景观理论和“SPEAKING”模型的基础上对样本进行了归类和分析。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表明,印度语言景观较好地发挥了信息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象征功能。

在语言景观的信息功能方面,印度语言景观实现了标牌创设者到读者的有效信息传递,并反映了在一定地域中语言的权势关系。一方面,标牌创设者基于标

① 蒋哲杰:《印度复杂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语言生活黄皮书——世界语言生活报告(2016)》,商务印书馆,2016,第92页。

牌预期读者和功能需求考虑,既可以在语码选择方面契合实际需要,又能选取适当的多语安排策略和语码混合手段,合理利用当地的交际规约,使得标牌信息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多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基于语言景观指示地域区划的功能,印度语言景观的语码特征可作为印度各邦、各城市的标志,此外,印度语言景观直观体现了社会语言结构,呈现了印度各语种相互竞争和制衡的格局。

在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方面,主要关注了印度语言景观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和社会特征。一方面,在印度多语言的社会中,本邦语言在语言景观中较高的出现频率象征着同一语言使用者的高聚集度,这也是印度语言建邦政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印度语言景观体现了印度社会中语言的民族性和政治性,地方势力通过语言构建的族群认同凝聚为复杂而深刻的政治势力,并在语言政策等方面与联邦政府的官方意志进行抗争。

此外,本研究发现印度语言景观实态与理论存在部分差异,具体表现为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与其实际使用人口比例不一致。这一差异源于英语在印度语言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英语并不是印度某一民族的母语,而是印度因英国殖民统治而被迫接受的外来语言。虽然在印度实际使用英语的人口较少,但英语在印度社会中仍受到广泛接纳和认同。在印度遭受殖民以来使用英语的语言实践中,英语与印度本土语言发生了融合,为非英语人口提供了理解英语文本的可能,也为语言景观的丰富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语言景观实态与理论的差异性,可以对语言景观理论加以完善。传统的语言景观理论认为,语言景观是文字语言,而不是口语,是“视觉信息”,而不是“听觉信息”。这一观点表明,传统语言景观理论聚焦于其符号学意义。然而,印度语言景观中的语码混合现象,虽然以视觉符号呈现,但在发挥信息功能时更多体现的是其“听觉”含义,即读者在接受印地语-英语混合文本时,在视觉上接受英语文本,但随即以语音为中介,将英语文本的发音对应到印地语(或其他邦语)文本上,以此理解标牌含义。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如语码混合一类的特殊语言现象,需要对语言景观所体现的各层信息,如视觉层、听觉层乃至语言表现出的感情色彩层,均加以适当考虑,而非局限于其视觉信息。

此外,尽管在对印度语言的研究中,地方性小语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但在语料收集过程中,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公共标牌都只涉及主要语言,而较少涉及地方性小语种。同时,还有一部分语言没有对应的文字,也就自然地被语言景观理论忽略。因此,笔者认为,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例如,针对地方性小语种,可以深入考察更为边缘的、非公共化的媒介,如社交媒体、街头涂鸦、小传单等;针对无文字的语言,可以适当考察当地的语音播报,作为视觉景观无法触及的领域的补充。

印度作为典型的多语言国家,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到印度各语言群体的交流、沟通和权势关系,与印度国内民族关系和政治局势亦有密切关联。在既有的历史因素和社会现状下,印度在语言政策上积极奉行承认和包容的原则,从而使国内局势得以保持稳定。印度对于国内复杂的语言问题的治理方式,亦可作为世界上各多语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参考。本研究引入的语言景观研究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新兴热门领域,具有较强的活力,为印度现行语言政策下的社会现实提供了新颖的阐释维度,语言景观理论体系也可在研究实践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本文编辑:李亚兰]

policy, Bangladesh achieved stabl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pcoming general election, Hasina holds advantages in many dimensions but also faces challenges from society,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dividuals.

Keywords: Sheikh Hasina; Bangladesh; Awami League; Governing Philosoph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Indian Multilingualism Based on Google Street View

SU Jing LIN Xuxuan

Abstract: India is one of the most linguistically complex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aracterized by a vast number of languages and diverse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s. Existing research on India's multilingual phenomenon primarily resides within the realm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lacking empirical analyses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mploys Google Street View to collect signage data from three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India. Drawing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Theory and the "SPEAKING" model, a combin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is adopted to analyze 606 valid samples to explore the informational and symbolic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 India.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India's linguistic landscapes effectively convey signage information through appropriate language code selection, multilingual arrangement strategies, and code mixing.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lso serve as markers for regional delineation. In terms of symbolic function, the higher occurrence of local languages can symbolically represent demographic weights, but the frequency of English in linguistic landscapes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actual demographic weight of English speakers. Additionally, linguistic landscapes created by fede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manifest the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ure of Indian languages, symbolizing official intentions and ethnic identities of language communities. In summary,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India's linguistic landscapes effectively fulfill informational functions and, to some extent, symbolic functions. As a quintessential multilingual nation, India's linguistic situat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directly impact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 and power dynamics among its linguistic communities, closely intertwining with domestic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dia's governance of language issues also serves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multilingual and multi-ethnic nations worldwide.

Keywords: India; Multilingualism; Linguistic Landscape; Google Street View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Śakti and Śākta

HE Yun

Abstract: Shaktism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Hindu denominations and an important field in Hindu studies, of whic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Chinese could be found in ancient Buddhist scriptures as well as in modern Indology studi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the terms Śakti and Śākta. This article develops its argument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is defining Śakti and Śākta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of Shaktism and its scholarships. Second is a textual review of the terms' translations appeared in literatures from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to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 Third is a crit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all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categorizing them into three phases including the non-translation dominating period, literal translation dominating period and transliteration dominating period. This article combines textu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to examine various translatio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o seek the un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roper translations.

Keywords: Śakti; Śākta; Devī; Translation of Name; Hinduism

On the Spread of Ancient Indi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WANG Guoping SUN Xiqin

Abstract: The spread of ancient Indi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especially in Asian history, regional history and national